

符号资本的制度化与工人阶层再生产 ——以农民工群体为例

石红派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530006; 2254874594@qq.com)

摘要: 中国社会转型中,“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称谓嬗变,实为符号资本与制度化机制共塑阶层再生产过程。主流话语通过“符号赋义”旨在提升农民工的职业声望与社会地位。然而,这一过程受到以技能资本化为核心的制度筛选机制地过滤与重塑,导致农民工在技术资质、权益保障等维度形成新型边界。农民工则基于经济理想与流动策略展开多维身份协商。工人阶层正从传统基于户籍制度的显性分割转向以技术与能力为基准的、更具弹性的隐性秩序再生产。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符号之意义真正落地为“同工同权”的物质实践,是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农民工; 产业工人; 符号资本; 制度化; 阶层再生产

引言

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加速转型的背景下,“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称谓演变,绝非简单之语义置换,而是符号权力运作、制度实践逻辑与阶层再生产机制交织的在场之域。该转变既折射出政策话语对新型劳动主体的符号建构与正义诉求,也揭示出社会生产实践与工人实际境遇之间的深层结构张力。具体而言,经由制度引导与公共话语的共塑作用,官方推动“产业工人”“新市民”等能指的政策化生产,旨在形塑符合现代化进程的理想型劳动主体。然而,符号层面的身份升格,一定程度上却很难提升该群体在物质条件与社会权利层面的实质地位。例如,以农民工群体为例,其城镇医保参保率仅21.89% [1] 的实证数据证明,符号层面的身份认同与制度保障间尚未形成有效衔接。因此,正是这种符号资本与制度实践的“脱嵌”,构成了观察转型期工人阶层再生产中弹性机制的关键切入点。这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

回顾既有之研究成果,不同学科对称谓嬗变这一议题的阐释存在理论分野。政治学视角侧重于将称谓变迁解读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命名政治”实践 [2]; 传统社会学分析则聚焦户籍等制度结构对劳动群体所带来的排他效应 [3]。二者虽均富洞见,但现有探讨尚未充分揭示称谓作为一种中观机制,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社会中,其如何在宏观制度与微观实践的互动中,引致工人群体的就业质量分化与阶层的再生产。鉴于此,本研究尝试融汇多理论资源,构建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框架。以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为基点,将称谓视为实践场域中的符号资本形式,考察其通过实践衍化为新型社会流动抑或区隔机制;引入劳动过程理论,剖析“技工”与“零工”等用工形态分化背后资本对劳力价值的精细化评估与等级化塑造;并融入后结构主义对主体性的关切,审视劳动者在话语协商中的能动性策略。因此,称谓变迁实则是在“符号-制度-主体”三维互动的动态过程,须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生成语境中予以系统观察。

1. 符号资本的象征附义与分层逻辑

社会分类体系之变迁,尤其是对特定群体的赋权,是符号资本在场域再生产中的结构性表征,它既关乎社会整合的时代命题,却又在物质实践中显影制度实践与话语承诺的非对称性耦合。

1.1. 政策导向的象征性赋权

在现代劳动治理中,常以社会类别的符号重构实现秩序再生产。以《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为例,国家系统推动“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型,其本质远超消除身份歧视,更是一套嵌入劳动体制的符号赋义与价值重估实践。具体而言,该系统工程围绕三重维度展开。其一,身份标识层面,以更具包容性的“产业工人”取代此前基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钟摆流动的“农民工”,标志着从先赋性身份制向后致

性成就制的现代性转型。其二，在价值编码层面，借助“大国工匠”“技术能手”等话语构建一套以知识、技能为导向的文化资本体系，拓宽劳动者的价值增值路径。其三，伦理塑造上，依托职业荣誉表彰、技能竞赛等机制，引导劳动伦理从外在规训向内在认同转变，强化社会韧性与整合效能。然而，在这一社会生成过程中，此类符号实践迅速与市场理性形成“结构耦合”，将劳动关系中的不对等交换，巧妙转译为充满希望的个体发展叙事。如通过对农民工群体的访谈显示，在雇佣场域中，计件工资制对劳动时间的极限利用被重构为“多劳多得”的绩效理性；灵活就业模式则被赋予“自主选择”的话语正当性，从而将企业组织风险转移为个体应承担的职业生涯风险。至此，劳动过程中的客体化与主体性消解，被转化为可通过自我努力实现的资本积累想象，结构性困境在微观层面被系统地编码为“个体化归因”。

1.2. 所谓的区隔实践与技术附义

在“农民工”到“产业工人”这一新构建的话语序列中，话语的符号资本发挥着显著的筛选与区隔功能，折射劳动力市场的深层结构。依据福柯的“话语装置”理论，“农民工”标签及其引申的“候鸟式迁移”“代际贫困”等隐喻，持续再生产结构性排斥的“自然化”效应。如当平均年龄43.1岁、基础教育完成率仅66.7%的农民工群体在社会中被固化为“低技能、高流动”的认知图式时[4]，结构性排斥机制便完成从制度到认知的转化。反观“产业工人”的符号重构，其遵循着资本增值的象征逻辑，通过技术资质的科层化认证、生产场域的技能升级及职业教育的文化资本投资，完成了劳动力位阶跃迁。然而，符号转换仍存在着内在矛盾，即使用用人单位或企业将“机械工”、“操作手”重塑为“技术员”，岗位程式化工序的本质并未发生本体论变革。因此，所谓的符号功能展现出双重解域化特征。一方面，以技术赋能的命名政治正逐渐消解传统户籍制度所设定的物理边界；另一方面，又将劳动价值评估纳入弹性化的个人能力框架之中，最终服务于社会柔性治理的构建与巩固。

1.3. 制度性遮蔽与风险的个体化转嫁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语境下，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的称谓变迁，构成了一幅观察社会分层的复杂图景。这一符码重构过程，表面上标志着劳动价值在现代性话语中的重新定位，并借助象征资本的注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职业尊严感；然而，其背后却深刻暴露出身份政治中的结构性张力，即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福利差序格局与权益分配断层依然顽固存在。实证数据清晰显示，制度性排斥并未伴随称谓更迭而消解，例如在商业服务业中，高达85%的农民工未能获得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而制造业领域所谓“产业工人”的无保障率也达到77.69% [5]，凸显出符号演进与权益分配的“脱嵌”危机。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视角审视，劳动技能的异化已演变为一种新型市场筛选机制。即当中低技能群体陷入“技术脱嵌”困境时，他们所遭遇的不仅是岗位层面降级，更经历多维社会排斥的强化。如教育回报的递减抑制了人力资本积累；居住分异的空间政治则限制了社会网络的扩展，最终形成从技能贫困到机会剥夺的恶性闭环。质言之，这一闭环不仅在现实层面固化了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也在话语和制度层面不断完成对排斥机制的再生产与合法化。

2. 制度实践场域中的技能分化

制度性筛选是理解当代劳动力市场分层逻辑的关键中介。其通过构建一套以市场绩效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并深度嵌入劳动契约、职业认证与数字平台等制度载体，从而完成对劳动力的精细化甄别与等级化配置，最终从基于先赋性身份的行政分割转向依托后天技能培育与文化资本化的绩效区隔，催生出具有代际传递效应的新型职业边界。

2.1. 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分层标准重构

市场经济转型深刻重构了我国劳动力分层的制度基础。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下，以户籍身份为基石的行政分割秩序在劳力初次配置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让渡于以社会绩效主导的制度筛选体系。在此过程中，由“技能禀赋”与“职业稳定性”构成的复合指标，取代了以往的身份标识，成为界定劳动者市场位阶的关键变量。更深远的是，技能本身也经历了从实践能力向制度化资本的嬗变。如崔岩 [5] 所指出的，技能不再仅是完成具体任务的工具性能力，而是被制度性地编码为一种可投资、可认证、可增值的“人力资本”形态，借助教育资历与职业资格等符号媒介，在劳动力市场中传递优势信号，显著影响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与就业质量的结构位置。总之，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劳动力评价机制的范式更迭，也折射出分层标准市场化与阶级再生产机制之间的深刻联系。

2.2. 制度的筛选效应与路径依赖

制度实践的筛选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中主要通过职业准入规则、技能评估体系与用工形式的制度性设计，构建起一种貌似中性、实则深度嵌入分层逻辑的筛选装置。在现实运作中，技能认证制度不仅扮演技术能力衡量工具的角色，更在无形中参与社会资源再分配。以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为例，技能等级的高低不仅决定了劳动者的收入上限与就业机会，更关联住房、公积金、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附加性城市福利的获取通道，形成了资本权利的衍生机制。这种制度性筛选并非单纯的能力识别过程，而是在制度编码与市场偏好的协同作用下完成对劳动力的分层甄别。具体而言，低等级技能证书往往对应着高劳动强度与低社会保障的岗位属性，而高等级技能认证则集中在垄断型、资本密集型企业及国有单位，形成一种通过技术标准隐性排斥底层工人的结构机制。同时，用工制度的灵活化趋势进一步固化了这一筛选体系的排他性。例如，劳务派遣与外包制的广泛应用，使得技能不达标者长期处于非正式雇佣状态，不具备完整的职业晋升路径与社会福利保障，其在制度意义上被固定为低端劳动者。此外，技能培训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也加剧了分层再生产的路径依赖，许多中低收入群体由于缺乏时间、经济与信息资源难以进入正规技能培训体系，只能通过非正规市场接受碎片化培训，进一步陷入“低技能-低收入-低培训”的恶性循环。在此过程中，制度筛选机制不仅再现了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也通过“技能”这一表面中性的指标掩盖了阶层壁垒的再生产逻辑，使市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成为阶层固化的制度温床。

2.3. 技术排斥与算法治理的再边缘化

当多重制度性筛选产生叠加效应时，其效应不仅强化了固有的分层秩序，更借助技术迭代催生出更为隐蔽的“再边缘化”机制。所以，其运作逻辑需从技术与制度的交互中加以审视。首先，一种基于技术排斥的边缘化机制正在显现。以智能制造业为例，传统工人因历史形成的技能禀赋差异，面临显著的数字化鸿沟，他们被排除在政府或市场主导的技术支持体系之外，构成了制度筛选的首道关卡。随之，绩效考核体系与科学技术迭代会持续生产“效率惩罚”的复合效应，即劳动者因技术适应滞后导致效率损耗，进而承受经济层面的惩罚，最终被推入劳动强度更大、社会保障更弱的次级劳动力市场，陷入“技能滞后-制度支持缺位-职业下行”的负向循环。在此过程中，技术作为再生产的资本，通过“自然淘汰”的拟真叙事，将结构性支持不足合理化为市场法则，并催化阶层的再生产。

其次，一种更具隐蔽性的边缘化机制，源于嵌入在技术系统内部的算法治理。在平台经济中，技术系统的运作蕴含双重分化逻辑。其一，是物质层面的“效率宰制”。如算法通过将骑手的配送路线解构成标准化的时空节点，或通过订单分派系统向网约车司机转移经营风险，其核心功能都是将复杂劳动解构为可量化控制的效率参数，实现价值的非对称性转移。其二，是符号层面的“话语转译”。算法系统凭借“技术中立”的特征，辅以“多劳多得”的强有力个体化叙事，将由平台资本设计的结构性风险转译为劳动者的个人能力差异或选择结果。由此可见，无论是由先进生产体制淘汰的传统工人，还是被平台算法重新配置的新型数字劳动者，其背后都可能指向“隐性数字弃民”[6]之风险。

3. 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与阶层意识

“农民工”到“产业工人”的符号转变，它既是现代社会对劳动者的身份赋权，也是其应对制度不公的策略性自我定位。这种在“赋予身份”与“筛选现实”之间的张力，恰成为制度逻辑与主体能动协商的中间地带。

3.1. “产业工人”接受的群体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的称谓认同机制与老一辈农民工呈现出显著的代际异质性[7]。前者通过主动选择“产业工人”的身份，展示出对文化资本的积极认同和自我塑造。在消费场域中，他们依托身体实践策略展现自己的城市身份，将这种认同转化为象征性资本，形成对城市生活的文化占有感；在数字平台则通过“打工人”亚文化的戏谑叙事，既表达对城市生存境遇的反思，又隐含借助亚文化资本实现社会流动的智慧。这种符号性的文化操演不仅是对阶层想象的再生产，更是他们在转型期社会结构中谋求突破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打工人”这一标签被赋予了更多反叛和自嘲的意味，既有对现实生活的认同，也隐含对抗社会不公和寻求上升通道的深层意图。相较之下老一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遵循“经济资本优先”的务实逻辑，体现“叫啥不重要，挣钱才是硬道理”的工具理性生存观。可见，其身份建构聚焦于经济资本的积累，弱化了文化符号资本的赋指功能，形成与物质生活紧密关联的认同模式。

这种代际分异，实际上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不同资本形态的价值嬗变。新生代群体在看重经济资本积累的同时，更通过文化符号资本和社会网络资本的协同运作谋求阶层突破，表现出多元复合的社会流动路径。而老一辈群体则坚守经济利益至上的物质策略，其身份认同更直接与生计挂钩，缺乏对文化资本的深度

关注。这种代际间的认知差异，不仅揭示了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新作用，更映射出劳动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对资本转换的不同适应策略，生动呈现了当代中国劳动力群体在文化语境重构中的位置探寻与阶层流动实践。

3.2. 身份认同与阶层归属感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筛选在农民工群体中造成了显著的身份认同差异和阶层归属感分化。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技术工人通过职业资质认证和技术培训积累文化资本，形成了一种明确的向上流动的身份认同模式。对于这些技术工人来说，获得专业资格认证不仅是提升个人技能的途径，更是他们实现社会阶层跃升的重要标志。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框架下，这些工人通过职业资质的积累，实际上在构建和展示自己的社会身份时，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和资源。这种身份认同模式强调的是“职业晋升驱动”和“阶层地位提升”之间的正向循环，表明他们的身份认同与向上流动的愿望紧密相连。而与此相对，零工群体因长期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面临着来自制度性区隔的制约。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这些零工群体往往形成了“风险感知-身份防御”的认知图式。他们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并因此形成了一种防御性的身份认同策略，倾向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应对当下的生存压力上，而非追求上升的阶层变动。其阶层感知往往带有较强的防御性和自我保护性，缺乏有效的社会流动途径，身份认同更趋工具化与生存导向。

这种身份认同与阶层归属感的分化，正如韦伯社会分层理论所指出的，职业稳定和市场能力是决定阶层归属感的重要中介变量。不同群体通过不同的社会认同机制，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阶层感知结构，进而影响其对生活机遇的感知和把握。这种差异化的社会认同机制，揭示了劳动者在市场和结构中的不同处境及其由此形成的阶层意识。然而，在这一传统的社会结构分层之外，数字媒介技术为新老农民工群体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化抵抗空间。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打工人”等符号的崛起，赋予了劳动者在符号层面进行自我表达和文化抵抗的可能性。短视频平台上的“打工人”文化，通过自嘲修辞和身体表现等手段，既能够在符号学层面去除生活困境的负面标签，也能在实践层面借助戏谑叙事重构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这种文化实践不仅突破了传统的制度性区隔和象征性边界，更通过亚文化资本的积累，使得劳动者能够在文化层面与主流阶层话语展开对抗，重新定义自己的社会角色和阶层认同。简言之，短视频平台的这种文化抵抗不仅反映了劳动者在面对社会不公时的集体智慧，也展现了他们在符号和实践层面通过集体创作来进行阶层自我提升的潜力。因此，数字媒介的兴起，不仅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了新的自我认同空间，也为他们创造了更多表达与流动的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阶层话语和制度性区隔进行了富有创意的改写和挑战。

3.3. 主体能动实践中的阶层再生产

主体性行动与分层逻辑再生产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嵌套关系，劳动者并非被动接受制度筛选与市场规训的消极载体，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展开策略性的实践回应。然而，这种回应往往在抵抗中参与建构，在自我优化中加固既有分层逻辑。在技能获取与职业晋升的路径中，大量劳动者出于对稳定收入与社会认同的渴望，主动参与各类职业培训、资格认证与平台劳动，但其主体性实践被制度与资本结构所规训，最终难以突破由制度壁垒与文化编码共同构成的分层机制。例如，在制造业与平台经济领域，许多工人通过自费报班获取技能证书、接受线上学习、更新简历与岗位技能，以图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但由于培训体系与就业岗位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这种努力常常陷入低效循环。在平台劳动场域，打工人以算法规则为逻辑框架展开绩效竞赛，在个体化竞争中耗尽时间、体力与情绪资源，却难以改变高流动性与低保障之处境。更为隐蔽的是，这类主体性行动在文化层面上强化了个人责任叙事，将结构性不平等掩饰为个体能力差异，使劳动者在自我鞭策中认同了市场秩序的正当性。在社交媒体等文化实践之场域，工人们通过自嘲、反讽、共鸣与模因表达焦虑与不满，这些亚文化表达虽在一定程度上撕裂了主流话语的幻象，但在被流量机制吸纳之后往往转化为消费性娱乐素材，失去了对制度批判的持久效能。因此，主体性行动既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机制，它在适应中不断调和现实矛盾，在妥协中不断加深阶层锁定，使得分层逻辑在日常实践中获得自我维系的文化合法性。

4. 结论与讨论

综观“农民工”向“产业工人”嬗变的符号轨迹、制度实践与主体博弈，这场称谓变迁本质上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符号—制度—主体”三重维度动态协商的具象化呈现，其既折射出国家治理术通过象征资本重构推动劳动主体性现代化的努力，也暴露出社会分层机制在符号净化与制度筛选中的隐性运作逻辑。从政策话语的符号建构来看，“产业工人”的术语升级虽以“工匠精神”“技术能手”完成劳动价值的现代性编码，消解了户籍身份的传统污名，却未能弥合符号赋权与权益保障的结构性断层——无论是农民工群体21.89%的城镇职工医保参保率，还是制造业“产业工人”77.69%的社会保障缺失率，均揭示出象征资本增值与物质利

益改善的非对称耦合，语言在此已超越分层记录工具，沦为将“制度性排斥”转译为“个体能力危机”的合法化装置。在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实践层面，市场化转型驱动分层标准从“户籍-身份”向“技能-稳定性”重构，职业资格认证、算法管理与灵活用工共同搭建起梯度化筛选体系：高等级技能认证绑定城市福利资源，低技能群体则陷入“低培训-低收入-低保障”的恶性循环，50岁以上农民工因数字技能赤字遭遇的“职业降级”与平台经济中“数字弃民”的涌现，更印证了制度筛选如何通过“中性”技术标准强化阶层壁垒，形成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的职业边界。而在主体认同维度，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打工人”亚文化的戏谑抵抗、技能培训的主动参与寻求阶层突破，老一辈农民工则坚守“经济利益至上”的生存理性，尽管数字媒介为劳动者提供了符号层面的文化反抗空间，但短视频平台的流量逻辑常将批判话语转化为消费娱乐，自费技能培训的低效循环也使主体性实践陷入“自我优化却加固分层”的悖论——劳动者在个体化竞争中认同了“能力决定地位”的叙事，反而成为分层逻辑再生产的隐性推手。

这场称谓变迁的深层启示在于，社会分层从来不是单向度的符号操纵或制度设计产物，而是多元主体在文化再生产场域、资本积累体制与数字实践空间中持续博弈的结果。若仅停留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的语词迭代，忽视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差序、技能认证体系的资源倾斜与平台经济的算法剥削，则符号治理终将沦为遮蔽结构性矛盾的“修辞游戏”。真正的劳动权益保障与社会公平，既需要突破“象征准入”与“实质排斥”的制度性张力，将技能认证与社会保障、职业晋升深度绑定，消解因技能贫困带来的机会剥夺的恶性闭环；也需要超越亚文化抵抗的短暂效能，构建能将劳动者个体诉求转化为制度变革动力的集体行动机制；更需要警惕语言祛魅背后的价值陷阱，在反思称谓变迁的同时直指资源配置的正义内核。唯有让“产业工人”的符号意义真正落地为“同工同权”的物质实践，让技术赋能真正转化为阶层流动的有效通道，才能实现从术语升级到权益升级的实质性跨越，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劳动群体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公正性的发展图景。

基金项目

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gxmzu-chxs2024179）。

参考文献

- [1] 刘帅, 郎敏, 郭庆海. 非农就业, 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基于双变量Probit模型的分析 [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1(4): 63-73.
- [2] 苗红娜. 国家治理, 市场理性与公民权利: “农民工”称谓变迁的内在逻辑 [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7(6): 8-14.
- [3] 李强. 关注转型时期的农民工问题(之三)户籍分层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2(8): 16-19.
- [4] 国家统计局. 202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J]. 建筑, 2024(5): 60-63.
- [5] 崔岩, 黄永亮. 就业技能与职业分化—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及其社会后果 [J]. 社会学研究, 2023, 38(5): 112-133+228-229.
- [6] 李胜蓝, 江立华. 新型劳动时间控制与虚假自由—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20, 35(6): 91-112+243-244.
- [7] 赵佩, 黄德林. 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的内在机制—以城市归属感作为中介变量的实证考察 [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1(5): 36-43.